



国家级特色专业（汉语言文学）
建设点学术文丛



这是学界从整体上研究新世纪诗歌的首部专著，对于了解中国新诗在新世纪以来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走势、分析现代思想文化对新诗创作的影响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和指导意义。

张德明 著

新世纪诗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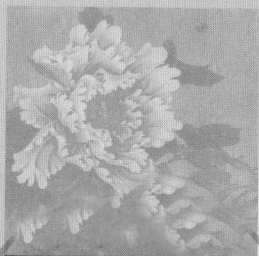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级特色专业（汉语言文学）
建设点学术文丛

张德明 著

新世纪诗歌研究



张德明 著
张德明 著
张德明 著
张德明 著
张德明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纪诗歌研究/ 张德明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 11
(国家级特色专业 (汉语言文学) 建设点学术文丛)
ISBN 978 - 7 - 5668 - 0663 - 5

I. ①新… II. ①张…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6046 号

.....

新世纪诗歌研究

著 者: 张德明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 划 人: 熊家良 杜小陆

责任编辑: 杜小陆 谭水漩

责任校对: 李 庆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弓设计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

定 价: 32.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 序

湛江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的“学术文丛”正式出版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作为湛江师范学院最早设立的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经过 30 多年的不懈努力，坚持以课程建设为基础，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团队水平不断提高，实力不断增强，教学科研齐头并进，专业建设各个方面得到了健康、协调的发展。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上组建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湛江师院学术知名度最高、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一级学科，也是最能体现湛江师院办学特色的学科之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已形成了一支高职称、高学历、高水平 and 充满活力的教学科研队伍。学术前辈劳承万教授继《审美中介论》（增订本，2001 年）之后，近年又出版了《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2010 年）和《中国诗学道器论》（2010 年）两部专著，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文章，形成了他的“美学三论”的宏伟构想，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此外，刘周堂教授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及赵金钟教授的家族文化研究，刘海涛教授的小说学研究，张应斌教授的文学发生学研究，王阳教授的模态叙事学研究，李珺平教授的抒情学研究，李新灿教授的《红楼梦》研究，唐雪莹教授的地方戏曲研究，阎开振教授的京派文学研究，张德明教授的新世纪诗歌研究，王钦峰教授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和法国文学研究，朱城教授的语文辞书释义研究，方平权教授的古汉语词义理论研究，葛佳才教授的全方位、多层次比较下的东汉特殊语法研究，陈云龙教授的粤西濒危方言调查研究，马显彬教授的普通话教学研究，以及杨泉良教授的语文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和周立群教授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等，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学科的部分成果在国内学术界具有开拓性，有的成果地方特色鲜明，为地方文化建设发挥了指导、引领作用。

近年来，该学科团队共主持科研、教研项目 50 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8 项，部级项目 13 项，省级项目 20 项，厅级项目 13 项，科研教研经费总额近 600 万元；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3 项，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5 项，



市厅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15 项；在《中国语文》、《方言》、《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语文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发展教育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 90 余篇，核心刊物发表论文 330 余篇；在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 70 多部；成立了“康德—牟宗三研究所”、“粤西方言与文化研究所”、“南方诗歌研究中心”、“粤西语文教育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设立了“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湛江师院分中心”、“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湛江分院”、“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湛江工作站”等；举办了“中国诗经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第十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21 世纪中国现代诗第六届研讨会”、“第九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广东省第九届外国文学年会”、“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 2010—2011 学术年会”、“中法文学和文化关系暨纪念卢梭诞辰三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国际、全国及全省学术会议，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在“网大”大学排行榜中，湛江师范学院的文学类排名曾连续三年进入全国百强。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现已建成 6 个比较成熟的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均有 3~5 名教授和 2~4 名博士，各自形成了 2 个以上稳定而鲜明的研究方向。学术研究的总体方法和特点是：借鉴文化学和比较研究视野，探讨中国语言文学的特征与规律。其中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实践价值以及社会效应、地方意义上已形成一定特色，词义训释与辞书编纂有机结合、文献与方言相互参证以及从个人韵文入手研究方言史、从系统层面分析虚词、从禅宗切入讨论修辞等，视野开阔而角度新颖，方法科学而影响深远；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在普通话教学研究、现代汉字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等方面成绩不菲，尤其普通话教学研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文艺学学科立足于学术前沿，研究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与范畴、中外文论和中外美学的关系、中国文论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的选择与转换、中国文艺学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以及文艺学学科发展中其他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以文化学的视野和方法，研究中西文学关系、外国文学与文化关系、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理论等，在福楼拜研究和叙事学领域引起学术界较多的关注；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在诸子百家研究、释家文化研究、六朝小说研究、明清小说研究、近代戏剧研究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特色，突出哲学、宗教

文化与文学、人生的交互影响与渗透,注重理论阐述与文本分析的有机统一,传统与现代的兼容,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的交互运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注重加强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和当下人文思潮的密切对话,保持研究的时代感和鲜活性,对地域文学与文化、京派海派作家、七月诗派、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70后”诗人群等都有较系统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认真凝练自身的教育特色和科研方向,认为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已经取得比较扎实的成果,同时服务地方教育、文化建设的研究也渐渐崭露头角。因此,决心立足学科可持续发展和地方文化教育需求,依托教育部、财政部“第三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和校级重点学科,对属下的二级学科进行新的规划,对研究方向作出新的设计,对服务功能作出新的定位,对团队成员进行归并调整、优化组合,构建以学科形态建设为中心的基础理论研究、以粤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的地方文化研究、以语文教师职业素养为中心的语文教育研究“三位一体”的科研创新团队,并已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的资助。其中基础理论研究方向主要研究以学科形态建设为中心的美学、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文字学等各基础学科的本质规律和特点;地方文化研究方向主要研究粤西地区和雷州半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言、艺术、文化史、法国殖民史,以及粤西文化与岭南文化、中原文化乃至东南亚文化的关系等;语文教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大、中学语文教育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包括文学教育、语言教育、语文课程教学论研究,重点研究中学语文教师的职业素养、专业技能,以及粤西地区语文教育的现状、特点等。学科建设将以重大科研项目为纽带,以获取重要科研成果为标志,以锻炼、培育科研创新人才为核心,以成为国家级优秀创新团队为目标,从而彰显基础理论研究优势,形成应用研究特色品牌,增强服务地方社会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功能,全面提升团队的科研实力、竞争优势和服务社会的贡献力,探索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諧发展、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互补共赢的新路子,为地方高校的学科团队建设与发展提供经验和参考借鉴,促进高等学校文科科研模式的转型和师范院校教学模式及内容的变革,从而使学科专业建设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我们在出版了“国家级特色专业(汉语言文学)建设点系列教材”(一套10本,含《古代汉语专题教程》、《近代汉语专题教程》、《现代汉语专题教程》、《中国古代文学专题教程》、《中国现代文学专题教程》、《中国当代文学专题教程》、《当代外国文学专题教程》、《高中语文教学专题教



程》、《大学语文实用教程》和《新写作》，该套教材被列为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和高校公共课精品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后，计划再推出“国家级特色专业（汉语言文学）建设点学术文丛”。此次交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7部著作即是“基础理论研究—地方文化研究—语文教育研究”之“三位一体”科研创新团队的部分成果：

陈云龙教授立足湛江，在粤西地区濒危方言的整理、分析上有重大拓展，他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粤西濒危方言调查研究》以及教育部项目子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科研项目子课题等，有力推动了地方方言的调查研究。此次出版的《马兰话研究》即是对汉语濒危方言“马兰话”的抢救性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侯昌硕博士的《新时期旧词新义现象研究》对新时期以来普通话词义的动态变化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中又重点对专用词语语义泛化和词义的渗入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汉语词义最直接、最深刻地体现着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汉文化的历史背景和内涵，因此，研究汉语词义系统受到外来语的影响、渗透而发生变化，无疑具有很高的语言学价值。

张应斌教授学养深厚，视野开阔，并且一向对民间文化和地方文化情有独钟，其《嘯文学简史》以时间为线索，由古而今，由源及流，考察“嘯”的发生及其作为音乐意境在中国文学中的发展演变历程，追寻“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文学简史，从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角度，从特殊的文学题材史的角度，补充和丰富了中国文学史。

鲁红平教授的《理想的追寻，尘世的超越——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有感于人类因生存时间的局限而产生的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生命毁灭感和因生存空间的局限而产生的尘世束缚所带来的生命不自由感，认为中国人正是在儒家、道家、神仙家这三种文化交融碰撞之下，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纠葛中，形成了他们特有的解脱生命悲剧的方式，以求超越尘世，获得生命的永恒与自由。鉴古以观今，别具一番意味。

杨泉良教授的《语文教学的当下视野》正视转型期语文教育教学存在的制度与政策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观念与行为的矛盾，以语文新课程理念为依据，以语文新课程内容范畴为边界，以语文新课程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为线索，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的，构建起独具一格的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体系，突出了其实用价值和可读性。

张德明教授的《新世纪诗歌研究》系在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修改而成。该著对新世纪 10 年来的诗歌创作现象及文本进行全面考察,梳理其与当代文化思潮的关系,概述其思想内涵与美学特征,同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为新世纪诗歌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某些可行性方案。这是学界从整体上研究新世纪诗歌的首部专著,对于了解中国新诗在新世纪以来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走势、分析现代思想文化对新诗创作的影响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郑军博士的《留学生课外汉语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调查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留学生课外汉语接触情况与影响因素,发现母语是学生交际的主要语言,汉语是学生交际的次要语言;从学生自身和学生外部即中国人的角度研究了影响留学生课外汉语交际的因素,通过个案分析展现了留学生课外语言接触及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与动态性,从汉语资源利用最大化的角度对教育者和学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积极建议。

2011 年岁暮,湛江师范学院首次设立了“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校内教师出版学术研究成果;2012 年底,湛江师院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又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人才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的资助,这都有力地推进了该院特色专业与学科建设的步伐。这套文丛以及前套系列教材的出版发行,倘能得到各高校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帮助和指教,那将是湛江师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光荣!

熊家良

2013 年 5 月

如何认识新世纪诗歌（代序）

关于新世纪诗歌，我和张德明兄有过多次讨论，甚至共同开展过一些研究和编辑工作。这部书稿的起初，也是我们讨论的结果。但最终，我生性懒散，没再深入，而德明兄经过辛苦研究，终于写出这部沉甸甸的心血之作。在很多观点上我们有着一致性，基于这理由，他邀请我写序。

关于新世纪诗歌的特征和情况，我与英国大诗人叶芝有着类似的历史循环论观点。即大致是在一种高级的精致文明衰落后，会重新进入一个相对粗糙的多样性阶段，各种原创性的元素自发生长与竞争，中间可能出现某种野蛮的状况，但最终，会再升华转化为新的文明，逐步升级并最终到达高潮。

我认为当代诗歌具有“草根性”特征，这其实只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判断。而且此概念的提出已有近十年，很多情况已发生变化，但在较长时间内，我认为依然有效。

其实这也并非我个人的见解，可以说是一些已有的共识。比如在前些年举行的首届博鳌青年思想沙龙上，就有一些青年评论家讨论到新时期以来甚至“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失效的问题，认为从生产机制、传播方式到评价体系，新文学都存在很大问题，比如精英主导，观念先行，严重缺乏本土传统与民众基础，一切以西方现代文学为唯一尺度和标准，以获得西方承认为最高荣誉，在传播上采取从上到下强制阅读灌输。对此，我表示赞同，同时认为当代文学正面临着重大挑战。但总体而言，我对此不是持悲观的态度，我觉得危机也意味着契机，危机可以转化为出路。我提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这一情况可能有所改变，这就是我说的文学的“草根性”的出现，有可能发起新的文学革命，并创造新的文学高潮。

所以，“草根性”这一概念，要从两面来看，它是一个事实描述，并不代表一种很高的评价。但其中，暗含生机、潜力与契机，这是对某种诗歌的活力的肯定。下面我试着从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新诗的起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新诗是外来之物，作家李锐称五四新文学是从天上“盗来的火”，诚哉斯言。新诗是从上而下的，始终难接地气，无法深入普通中国人心灵深处，与古典诗歌不是一个级别。但几代诗人不懈努力，为其中国化探索各种路径，包括向民歌民谣的学习等，但后因战争及灾难被打断。

当代诗歌三十年，朦胧诗继承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重新接轨，仍然是“自上而下”的产物。一小批高干高知子弟得益于文化专制与垄断，比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读了所谓的“灰皮书”，向其学习模仿后——而且可能是断章取义的学习，引进至中国语境，没想到给封闭已久的沉闷空间打开了一扇窗口，朦胧诗迅速引起轩然大波，产生广泛影响。但是，这种表面的热闹其实是隐含危机的，具有泡沫化的特征，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示范性创作类同于精英号召或领导指示，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民意或民众基础，为什么“朦胧诗”被认为“朦胧”，其实说的是这种诗歌并没有广泛的市场和心理需求及基础，并不能真正打动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入他们的内心深处。这种震动的情况只不过类似于，因为相信这些高干高知子弟们是见多识广的，他们说的东西可能是好东西，再加上专家们善意地扶持和评论，人们才勉强先接受下来，但其实不一定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实可能只具有时代价值而没有真正的艺术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有年轻一代学者指出：其实是出于一种急切的现代化的愿望，人们将先锋小说过早经典化，但现在看来却有些承受不起。我觉得，朦胧诗的情况也完全类似，以至一个海子出来后，仅仅二十多年，朦胧诗都似乎有被遗忘和遮盖的迹象。

但朦胧诗毕竟开了一个头，从此，新诗不断下行，随着社会稳定带来的教育普及，新诗向中国的最基层渗透。虽然至第三代（含“60后”），当代汉语诗歌仍然具有精英化特征，以学院体制完成启蒙任务。按当时的说法，是“补课”。第三代诗人主要由中国各地大学的诗歌骨干构成。但比起初期只有一个北京中心，当代诗歌开始呈现多个中心的局面，地方性诗歌开始起主导作用，比如四川等地。但是，新诗真正被广泛接受，我觉得是只有到了21世纪初才发生，即“70后”、“80后”产生后，才比较彻底地完成其中国化、草根化过程，新诗才开始成为中国年轻一代的真实心理需要与精神追求，成为一个自下而上、逐步升华提高的过程。

这个过程还是一个激烈竞争、相互融化吸收、不断淘汰的过程，在这样的基

基础上，被逐渐得到公认和接受的具有独特天赋的个性化诗人和具有融合能力的优秀诗人脱颖而出，并得到广泛传播。在我看来，新诗的真正希望正在这里，可以断言，当代汉语诗歌开始进入一种自然生长、自由竞争、相互融汇的良性状态。只有这样，产生的诗人与诗歌才真正经得起时代与历史的考验。

在这一缓慢的、逐渐变化的过程中，我觉得特别要强调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第一个是盘峰论战，负责诗歌启蒙的精英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为此展开争论。刚才说了，朦胧诗本身是文化垄断的产物，其源头是“灰皮书”，在文化专制时代，只有高干高知子弟才能看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受其启发，从而一部分具有天赋的青年开始文学探索，加上占据北京的中心位置，便于传播，先在小圈子，然后通过公开刊物辐射。第三代虽然显得更丰富多样化，但大部分还是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的延伸，按当时的说法，是“补课”。1989年事件导致这一历程被打断。90年代中后期盘峰论战，撕开了诗歌垄断的口子。这是知识分子精英内部的分裂，一部分继续寻求新诗现代化，侧重于向西方学习，但他们寻求西方诗歌技巧与自身个人生活的联系，探索“叙事性”；另一部分主张要与中国普通民众相联系，吸纳中国本土资源，他们主张“口语化”，自称“民间”，其实他们并非民间，他们只是想代言民间。相当于，一部分强调诗歌写作的专业性，另一部分强调诗歌写作的公共性。但总体而言，仍然是精英化的知识分子，仍然主要注重对西方资源的吸取借鉴，但已由中西碰撞转向内部碰撞，是具有关键性的转折点。从这一意义上说，盘峰论战值得肯定，它撕开了诗歌垄断的一个口子，这个垄断以前是被学院、公开刊物和西方邀请的诗歌节等构成的。这是对旧的诗歌体制与机制的突破。神秘感被破除，秩序从此被颠覆，旧有规矩被打破，诗歌再一次迎来众声喧哗的“狂欢”。这一事件，也揭示了原有的一套文学生产、传播、评价机制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当代诗歌在此触底反弹，大撤退后大反攻。从此，拉开了当代诗歌由下而上的反弹。

诗歌界内部竞争碰撞，激发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局面，也刺激彼此互相关注吸取对方长处。但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收拾不住，再加上网络、手机等新技术应用和作用。新世纪以后，诗歌界进入我称之为“草根性”诗歌时代，进入诗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互竞争的阶段。现阶段，诗歌追求及主张很多，呈现多种诗歌路径，风格日趋多样化，但互不买账。在这一阶段之后，经过一种自由创造与自由竞争，在大混乱之后，也许就会出现融合性很强的被广泛接受的大诗人和诗歌。



第二个事件则是“打工诗人”的出现，前面说了，诗歌始终是精英们主导的，但其实，随着教育的普及，诗歌悄悄深入乡村城镇，悄悄深入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和心灵。我觉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打工诗歌、打工诗人浮出水面，引起关注，比如郑小琼、谢湘南、许强、刘大程等。这些打工诗人大多出身于偏僻地域，却得益于时代开放，教育普及，能完成和大城市同龄人同样的诗歌启蒙与诗歌教育，接触并学习经典。然后在工业化最迅速的珠江三角洲经历时代风雨的洗礼与个人痛苦感受的抽打沉淀，完成了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的积累，领悟和思考一系列或细微或重大的生活和心理问题。于是，众多外在条件和因素刺激他们的灵感和写作欲望，天赋与才气得到激发，诗歌创作处于一种喷发状态，得到诗歌界同仁的关注与扶持。再通过网络，他们的诗歌获得广泛传播，最后也被主流诗歌界接受。这也证明了，只有自由生长并经过真正的激烈竞争后获得的承认，才是基础牢固的。如果只是因为天然占据一个高的起点与位置，即使短暂地获得声誉，也是靠不住的。打工诗人们在没有任何个人背景的情况下，迅速地难得地获得了学院、官方和民间乃至普通底层民众较为普遍的认同，这样的诗歌才有持续的生命力。与盘峰论战比较，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的出现，说明新诗已经开始在普通民众之中扎根，并且在这一基础上，由下而上不断提升。

第三个事件就是“梨花体”、“羊羔体”事件，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不是大众远离诗歌，而是大众开始关注新诗，诗歌正在以一种奇特的形式重返大众的关注视野，重返文化和舆论的中心。同时，人们对新诗也有了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外来的新诗要本土化、草根化，必然地，要经历大众化、普及化的检验，在这一检验过程中，一些诗歌、诗人受到严厉审视、挑疵，几乎是必然的现象。只有经历大众挑疵、精英审查，当代诗歌才可能获得一个更广泛的接受面，达到最大的接受程度，才可能出现诗歌的高潮。甚至，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还有来自国际诗坛的认可的问題，新诗必须经历这一切，这也是它的命运。

新诗走到这么一个阶段，产生这么一些新的情况和现象，我个人称之为“草根性”：一种自由、自然、自发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一种日常化的深入普通人民生活 and 心灵深处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一种由天空而来的诗歌终于接地气了。我所说的“草根性”，是基于个人的经验感受，针对的是新诗完全从外移植引进过来，因而水土不服，无法深入普通中国人心灵，所以，当代诗歌应该完成其草根化、本土化的进程。因此，我强调一种立于本土传统，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出发的诗歌创作，也就是“草根性”。所谓“草根性”，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指一

种自由、自发、自然的源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的原创性写作。但其实，“草根性”并非诗歌的最高标准，只不过是新诗的一种基本要求而已。就像当年惠特曼等人为摆脱英国诗歌而强调美国诗歌一样。“草根性”是诗歌的本体艺术自觉的必然产物，就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发展历程，就是每当文学从高潮走向低潮，面临僵化、模式化、八股化时，文学的本体自觉就会使之重回起点，再度“草根化”，向下吸取“地气”，再度走向新的创造与辉煌。

在我看来，“草根性”具有这么几层涵义：一、由于教育的普及，为文化民主化创造契机，这一次的诗歌浪潮是自下而上的，具有更扎实的基础，大量底层诗人甚至农民诗人、打工诗人出现可说明这一点。新诗历经九十年，终于深入中国最底层；二、网络及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为诗歌的自由创造与传播奠定技术条件，开辟一个更大的平台。在理论上，一个身处边缘乡村的诗人和北京、上海、纽约的诗人可以接收同样多的信息和观念，进行同样多的诗歌交流，并且，优秀的诗歌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三、新诗九十年，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思想上技巧上都有明显变革，再加上开放与全球化背景，当代汉语诗歌在短短三十年中大量吸收消化了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前六十年新诗三大传统，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定会有一批突出的诗人横空出世。这几乎与盛唐初期极其相似，一批具有“布衣感”的贫寒之士，借助唐代的开放氛围和上升气势，积极进取，共同开创了盛唐气象，林庚先生因此称盛唐诗歌为“寒士文学”。

关于“草根性”，用一位诗人最形象也最恰如其分的一句话描述，就是：如果说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那么，现在大地才真正觉醒，万物萌发，竞相争艳，生机勃勃。

二、网络与诗歌的“草根性”

在我看来，诗歌“草根性”的出现与网络有极大关系。其实，每一次文学革命的背后都有技术因素。每一次技术革命也必然带来文学的变化，释放文化创造力，创造文化新潮流。

甲骨文时代，文学的读者必然非常之少，作者也不多，因为，能阅读或用甲骨写作的，非贵族不能为。因其成本过高。文化成为垄断之物。到了竹简时代，情况有所好转，故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文化高潮，诸子百家争鸣，但竹简仍是士大夫私有财产，平民百姓难以接触。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使得图书制造



成本更为低廉,书本携带更为方便,中小地主得以获得教育机会,其创作也方便传播,大大释放了文化创造力,故积累一段时间之后出现盛唐,刚才说到林庚先生称唐文学是“寒士文学”,有“布衣感”,颇有道理。李白、孟浩然这样出自偏僻之地的诗人,借助新技术的创造,读到流传至穷乡僻壤的文学经典,又能通过个人天才的创造获得认可,迅速进入中心。这些寒士布衣的创造,成就了最伟大的文学高潮。再往后,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长篇小说创作成为可能,在明清小说广泛流行的基础上,最终出现《金瓶梅》、《红楼梦》……可见,在每一次大的文学创作的背后,都有技术的影子。技术产生两个有益的效果:一是教育得以更加普及,培养了创作者,进而释放文化创造力,同时也培养了读者,没有优秀的读者也就无法激发创造性;二是创作得以方便流传,使创作者获得动力与信心,创造更优秀作品。总之,文学借助技术的翅膀,迅速飞翔。

网络时代的到来,同样带来文学的繁荣与活跃。网络文学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网络,还包括手机,使教育及传播更加便捷。在理论上,全球一体化时代,一个身处乡村的孩子,通过视频,可以接受和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的教育,同样,他的创作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当然,“诗有别材”,文学有其神秘的一面,绝非仅仅技术就能成就,新的文学高潮的出现,还依赖长时期的积累,天才人物的出现,时代的风气与氛围等诸多要素。但是,网络,手机,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化,文化民主,文学大众化,是其必要条件和基础,是伟大创造的催化剂,使其具有可能性。

作为最自由的文体,诗歌尤其受网络影响。网络解构了文化的垄断,使得诗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形式,原来以公开刊物为主渠道的诗歌流通发表体制被无形中瓦解了。只要你的诗歌特点突出,就会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网络诗歌还打破了诗歌的地域限制,呈现更加自由开放的趋势,非常适合诗歌天然地自发自由生长的特点。网络诗歌发展尤其迅猛,据不完全统计,据说当代诗歌网站近万家。其中有代表性的诗歌网站和诗人有“若缺诗歌论坛”的陈先发、汤养宗、杜绿绿等;“下半身”的沈浩波、尹丽川、朵渔等,这两个论坛的诗歌追求比较明确;“文学自由坛”的臧棣、王敖、孙文波、明迪等,他们构成了一个跨国的诗歌网络;还有“平行诗歌论坛”的张执浩、小引等,以武汉诗人为主,包括杨晓芸等外地诗人;广东诗人俱乐部的宋晓贤、阿斐、沈渔等,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涵盖港澳台……很多诗歌新锐力量借此迅速冒出,并引人注目。网络诗歌正在成为最具建设性的一股诗歌力量。

当然，网络诗歌的低门槛，过于放纵随意，也经常遭到诟病。但总体而言，网络释放了自由的创造的力量，随着诗歌自身的发展，秩序和标准自会逐渐出现，创造文学新的高潮。

三、地方性诗歌的兴盛

诗歌的地方化其实有很早的历史渊源。在历史上，中国地方文化之多样性，就是奇特的景象。首先这与中国地形地貌之复杂性有关。世界上最具多样性的国家，仅从地形地貌上来说，只有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同时拥有沙漠、森林、大海、高山、冰川、雪地，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有，其他的国家地形比较单一。而我们都知，文化与地形地貌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历史上我们也从来没有“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概念，中国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在遭遇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化发生碰撞后产生的。以前我们说文化，我们习惯性地谈有所谓的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乃至西域文化、藏文化等，为什么？其实是因为历史上中国文化中心始终在不断移动之中，从未固定在一个地方，这就造成了各种文化互相竞争、相互融合促进的状况。

我个人认为这种文化的多样化及其自由竞争，恰恰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升华的原因，常常在一种主导主流文化衰落后，又有新的地方性文化注入新鲜因子，激发其内在活力。所以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其实可以理解为“礼”在当时的中心地区衰败后，可去偏僻边缘地区寻找，那些地方也许保存有，并反过来反哺中心地区；近代最典型的例子是清朝的所谓“中兴”，其实是湘楚文化拯救的，因为中心地区早已衰败。当代诗歌正在恢复这一古老的传统，地方性诗歌及其团体极其活跃……这样的局面与情况，与80年代确有不同，那时候朦胧诗一枝独秀，集中在北京，至第三代，情况稍有好转，但还是只有四川、华东两三个中心，四川诗人更是靠游走、诗歌串联来自创传播流通的渠道。如今，尤其是互联网诞生后，却是处处皆中心，反过来也可以说处处无中心，诗歌在各地顽强茁壮成长，地方性诗歌团体如雨后春笋，向上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充满生气活力。地方性文化保留的元气、阳刚之气，野性，也正是当下萎靡不振的文化重新振兴所需要的。

地方性诗歌团体由于其人员涉及各行各业，可以利用的资源较多，如在公开报刊组织诗歌专版，发起诗会，甚至对外交流，其能量辐射范围相当强大，力量 and 影响也逐渐壮大。同时，地方政府也对此种文化发展持支持态度，可以预计在



相当时间内，地方性诗歌及其团体会有大发展。

这一情形类似初唐和盛唐，出现过地方化过程。地方性诗人结成地方诗歌团体，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互相切磋，对外交流，充分地享受生活并表达着、创造着。盛唐初期的第一个大诗人孟浩然就是一个地方诗人，然后由他开始，地方诗歌团体之间通过竞争，逐渐出现一些得到公认的大诗人。这与当代诗歌的现状何其相似，现在已经出现不少地方诗歌团体和地方性的著名诗人，但还缺少得到广泛公认的大诗人，还需要经过一个淘汰与挑选的过程，才会出现为所有地方团体承认与社会广泛承认的诗人。当然，这需要时间。

地方性诗歌团体的兴盛，以前就曾有过，但未像现在这样多而持久，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平发展时间延续较长，地方经济文化逐渐增长，导致社会相对稳定，诗人也能够潜心于对诗艺的摸索和雕琢。事实上，现在中国各地已经开始出现这一趋向。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平、发展尤其是上升的时代，人们不需要什么核心、中心的引导。人们以各自的智慧和力量来建设各自的城市家园、完善各自的生活、创造各自的世界，这种时候，地方性资源和文化就会得到弘扬。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每个地方的人都对自己的家乡充满骄傲感，这跟80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80年代的风气，对自己的家乡是很鄙弃的，所以大家都往外跑。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每个地方的人总能找出一些自己家乡的优点。比如云南贵州人觉得自己环境好，广东上海人觉得自己有钱，陕西河南人觉得自己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总之，每个地方的人都自我感觉很好。这种地方性不断得到加强，就会产生很有创造性的文化。比如现在我们一说舞蹈，就会说云南的杨丽萍，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与创造；比如我们一说民歌，就会说到广西，这也成为独特性。

诗歌界这些年的地方化尤其明显。江南是中国诗歌传统最丰富深厚的地方，这些年，苏州的“三月三诗会”，采取纯民间形式，恢复古代的文人雅集形式，成为江南和全国诗人的盛会。目前已历五届。是国内最自由随意的开放性诗会，融踏春、饮酒、吟诵、创作于一体。苏州“三月三诗会”由江南诗人庞培、陈东东、潘维、张维、杨健、长岛等发起，其发起词里是这样写的：“江南山水平远，历属诗之胜境。三月三，大地回春，根据汉代以来的民间风俗，每年农历的这一天，人们纷纷到水边饮宴，去郊外春游、踏青。漫长的冬季过去，温暖的阳光拂面，诗人从纽扣眼里取出明媚的春风。‘忽听儿童欢拍手，花梢吹落美人簪’（杨蕴华诗：《春日》）。1633年（癸酉春）‘三月三虎丘诗会’首次在中国

苏州的乡间亮相，且以纯民间诗人雅集形式，历久弥新，在中国南北各地造成深远广泛的影响，诗人和百姓同乐，和自然、节令同庆。今天，我们力主恢复这一传统，尝试这样一份古老悠久的诗歌精神，在新诗即将迎来百年诞辰之际，通过汉语诗的不断更新，面向新诗的力量之源——民间；于每年的三月初三（农历），不避年龄，不讳风格，定期在苏州的虎丘（诗会发源地）或江南周边地区，举行一年一度的‘三月三诗会’。”确实，这是对传统的继承，又是新的诗歌的开始。江南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地方，又是传统和古典保护最好的地方，也许，正因为守护了传统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反而能获得创新的力量。

此外，云南诗人于坚、雷平阳都堪称地方性诗人的代表人物，其诗歌写作地域特色明显；甘肃诗人群古马、叶舟、娜夜、雪潇、于贵锋、梁积林等，扎根于西部，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边塞诗歌；山东近年来年轻诗人以群体崛起，引人注目，江非、王夫刚、邵筐、辰水、徐俊国、阿华、徐颖等的影响逐渐辐射到全国；海南诗人群被称为“诗歌海军”；湖北尤其活跃，有两个既联系又竞争的诗歌论坛平行诗歌论坛和或者诗歌论坛，又有《中国诗歌》、《汉诗》、《象形》三个刊物构成的诗人群，有联系又有区别；广东也是如此，《中西诗歌》、《诗歌与人》等民刊很多，诗生活等网站也很多，聚集了姚风、卢卫平、黄礼孩、世宾、莱耳等诗人，各个区域如深圳、珠海、中山等地本身就很活跃，还有大量移居广东的诗人如东荡子、梦亦非、阿翔、安石榴等，相互补充融合；陕西，一个古老的文化悠久的地方，却奇怪地酝酿着先锋诗歌，80年代的韩东、丁当等，现在则有阎安、伊沙、周公度、李小洛等人；此外，安徽、河北、广西、山西、四川、宁夏等地的诗歌群体和诗人们也非常活跃，各地诗歌团体互相应和、竞争，正形成一个良好的既互相激发又互相融汇的诗歌氛围，可以说是新诗九十年来最好的时期，并最终推动当代汉语诗歌走向一个新的创造高潮。

四、新红颜写作的兴起

“新红颜写作”诗歌现象，是指一种网络时代尤其是个人博客出现以后的女性诗歌潮流。由于教育的普及，女性诗歌创作群体的增长，网络和博客带来的创作交流与传播的方便，极大地解放了女性诗人的创造力。而且，女性诗歌和女性经验在以往的诗歌历史中相对薄弱和匮乏，因此反而带来新鲜感和新的创作方式。我个人觉得，作为男性诗人的一个对比和参照。女诗人们已经和正在写出一些了不起的诗歌，也许最终将改变当下的诗歌生态，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事情，